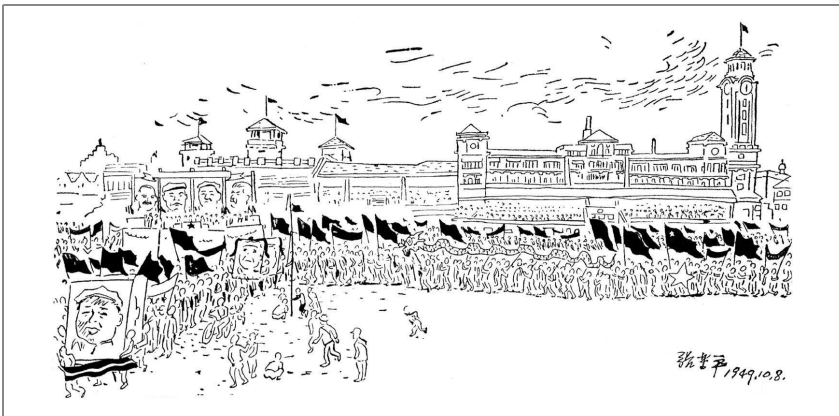


父亲张乐平在 1949

张妮妮



七十年前，我虚岁九岁，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也就在那年，我们从嘉兴搬到了上海，迎了解放军，父亲去了将要定为首都的北京开会……回想起七十年前的 1949 年，总觉得那年父亲非常非常的忙，我们家也发生了许多事情，使我更想念父母亲。

父亲张乐平画的《三毛流浪记》在前一年的 1948 年 12 月 3 日刊登了尾声《大千世界》，基本结束了在上海《大公报》的连载。（1949 年发表的两幅是以《三毛流浪记》名义加的，内容不能连接，故父亲生前一直没有将其列入此书的全集内。）这部长篇连环漫画受到读者极其热情的喜爱。老师和同学们也因为知道我是张乐平的女儿而很喜欢我，待我很亲切。

春节刚来临，当时我们住在嘉兴，父亲突然接到通知，便放下手中的一切，急匆匆去了上海。

几周后，父亲回来就宣布了让我们雀跃的事情：

我们全家要搬去上海了；
在上海将举办三毛画展；
根据《三毛流浪记》漫画改编的电影要开拍了……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先生创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要同我父亲联手，用家喻户晓的三毛的遭遇来呼吁大众救助流浪儿童。这次就是孙夫人要父亲去上海商量的。他们已经开始在积极策划《三毛流浪记》原作展览及筹备救助流浪儿童的“三毛乐园会”，父亲还要画三十幅三毛水彩画，准备为救助流浪儿义卖筹款。

住到上海没多久，最开心的儿童节就来了，爸爸妈妈给我们穿上漂亮的衣服，带着我们姐弟四人和堂姐浩浩去大新公司（现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参观了人山人海的“三毛生活展览会”。

名为“三毛生活展览会”的《三毛流浪记》原作展览，是 1949 年 4 月 4 日（当时的儿童节）正式开幕的，对大众开放五天，每天参观人数多达两万人。事前宋庆龄先生特地在燕云楼宴请我父亲，以表示对他的感谢。此前，中国福利基金会已于三月下旬在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的一幢弄堂房子里举办了预展，后又借外滩汇丰银行礼堂向在沪的外国朋友展出。宋庆龄将我父亲介绍给大家，还帮他做了翻译。在这次活动中，当场有一位苏联驻沪记者拿出 800 美元买下了一幅《三毛拉黄包车》的画。这是父亲赶制的三十多幅三毛水彩画准备用于义卖中的一幅。

正式展览中除了三百多幅三毛漫画原稿外，还有介绍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工作、该会儿童剧团以及育才学校的几十幅生活照片。我记得众多的参观者把展厅拥挤得水泄不通，有的人挤出来透透气又挤进去，看了一遍又一遍。很多父母像我家一样带着孩子来看，甚至有外地的教师带领学生特地赶来上海参观展览。

“三毛乐园会”在现场上为贫苦流浪儿童筹募基金。大家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些关怀“三毛”的慷慨解囊者之中，有不少人自己也只是勉强可以温饱而已。

父亲供义卖画的三十多幅三毛水彩画在开幕当天就被悉数买走，还有人要求预订。水彩画义卖得款、父亲为展览会设计的徽章卖出的钱以及父亲签售的《三毛流浪记》画册所得，悉数捐给救助流浪儿童的“三毛乐园会”。

会后，宋庆龄先生亲笔书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和感谢我父亲，还随信附送给我父亲几罐克宁奶粉及两块锡料。

4 月 4 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父亲的文章《我怎样画三毛的——为‘三毛义展’写》，他写道：

我每次新到一个地方，甚至我每天离开自己的屋子走到每一条大街上，我都可以看见我所要创作的人物。他们永远是瘦骨如柴，衣不蔽体，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以避风雨的藏身之处，更谈不上享受温暖的家庭之乐与良好的教育。我们这个好社会到处就是充斥着这些小人



投诉，为这些无辜的苦难的孩子们服务！尽管我的技巧还没有成熟，尽管我的观察还有遗漏，但我爱人类、爱成千成万在苦难中成长的孩子们的心是永远热烈的！十五年来，我把我对他们的同情、友爱，通过我的画笔付与三毛！我从未措意自己的劳苦，我更未计及自己的成败，我只一心一意通过三毛传达出人生的爱与恨、是与非、光明与黑暗……

父亲的另一件大事情是将漫画《三毛流浪记》搬上银幕。当时，电影虽然正在筹拍中，编剧阳翰笙，导演赵明、严恭已确定，但是由于昆仑影业公司拍摄场地迟迟没有空闲，特别是尚未找到合适的主演人选，所以一直没有开拍。1949 年初，版权合同即将到期，报纸上刊登了父亲的决定：等到合同到期，如果电影仍不能开拍，他将不再续签，另交别的企业公司拍摄。这对于昆仑公司是一个不小的促动。

1949 年 2 月，摄制组通知我父亲：“三毛”演员终于找到了。父亲看到化妆后的王龙基，高兴地说：“他就是三毛！”由于三毛已经成为上海市民熟悉的漫画人物，已经深入人心的漫画《三毛流浪记》如何搬上银幕，受到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多家报刊都对“三毛”扮演者的终于确定非常关注，做了及时报道。

此时，昆仑影业公司的摄影棚还是没有空。3 月 11 日，摄制组租借了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电”）二厂摄影棚。父亲几次去看望和慰问筹拍人员。4 月 1 日，电影《三毛流浪记》终于宣布在外滩开拍。父亲把报道拍三毛电影、举办三毛展览三毛乐园会的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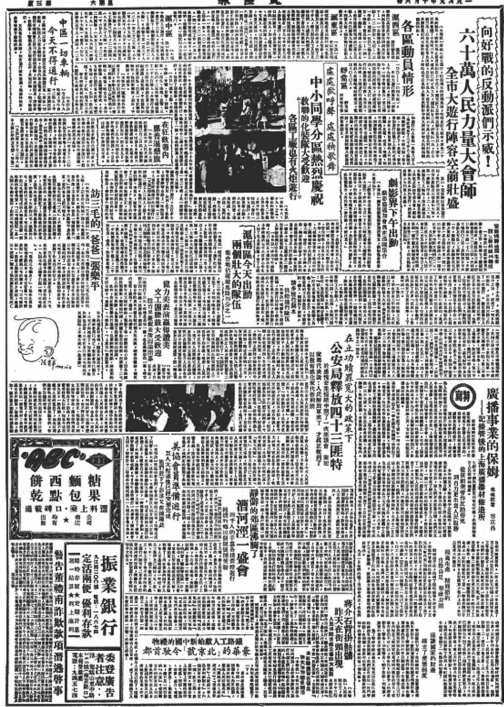
纸收集起来，做了一册剪报本。

那几天，爸爸妈妈很忙，大多不在家。后来才知道，三毛生活展览会结束后，父亲和陈鲤庭伯伯（导演）在僻静的南阳路上另外找了一间房子并住在了那边。就在那间小屋里，父亲与郑野夫、刘开渠、冯亦代、蓝马、陈鲤庭等叔叔伯伯们一起，悄悄地筹备欢迎解放军的工作。据冯亦代叔叔回忆：“一些写画的大幅宣传品，大多出于乐平的手笔。那时乐平身体不大好，可他还是没日没夜地干，他的热情鼓舞了许多朋友。”母亲则和上官云珠阿姨每天轮流去南阳路送饭，以免引起特务注意。5 月 27 日上海解放当天晚上，父亲他们一起跑上街头，把这些宣传品及时张贴、散发出去或者呈送给新政府。

母亲事后告诉我们这些时，我和妹妹背后嘀咕：早知道我们也要跟着去送饭、去派送传单！

我还清晰地记得，上海解放第二天清早，邻居姐姐叫着：“阿咪咪、阿小小（我和妹妹的小名）快点去看！解放军来了哦！”只见一队队的士兵行走在马路上，向市中心进发。

5 月 28 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父亲与刘开渠、杨可扬、陈烟桥、郑野夫、庞薰莱、朱宣咸、温肇桐、邵克萍、赵延年等国统区进步美术家，代表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进步美术力量签署了迎接解放的“美术工作者宣言”，提出国统区美术工作者决心“为人民服务，依照新民主主义所指示的目标，创造人民的新美术”。5 月 29 日，该宣言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上海近代美术



“旧社会业已死亡，新社会现已诞生，三毛不再流浪了。屋外锣鼓喧天，屋内秋阳满窗，三毛作者宣告三毛从此不再流浪时，不觉大笑。”

——1949 年 10 月 8 日《文汇报》

史从此翻开了崭新一页。

6 月 5 日，上海市政府举行了解放后文化界第一次盛大集会，科学、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文艺、戏剧、电影、美术、音乐、游艺等各界代表 162 人出席，我父亲也光荣地名列其中。陈毅市长在会上讲话，首先向坚持正义斗争的文化界致以亲切的慰问，继而分析当前形势，最后对共产党的文化教育等各种政策，进行了详尽的解释，欢迎文化界人士团结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

不久，父亲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首届代表大会代表，与巴金、冯雪峰、陈望道、赵景深、许杰等诸位知名人士一起，于 6 月 23 日登上列车，赴北京开会。7 月上旬，父亲才回到上海，带来了我们很喜欢的景泰蓝别针和从没吃过的北京蜜饯。他兴奋地和母亲说，见到了很多很多许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他们在抗战时期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去了重庆或其他地方。好友多年后再次相遇，他们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9 月初，根据父亲的《三毛流浪记》改编的电影终于完成，9 月底就在上海公映了。父亲专门绘制了一套三毛画片，由上海市影剧协会妇女委员会负责印制后组织电影明星在电影院义卖。

10 月 1 日，我们通过无线电（收音机）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父亲那几天都不在家——10 月 8 日在上海跑马厅要开一个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大会，父亲去现场参加筹备布置工作。母亲不带我们去，怕人太多会走散。不过，后来我们看到了好多父亲在会场画的速写（上图）。

父亲的肺结核在那年也痊愈了！这一方面得益于宋庆龄先生送的进口药“雷米封”，而他愉快的心情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0 月 8 日，《文汇报》刊登文章《访三毛的“爸爸”张乐平》，结尾写道：“旧社会业已死亡，新社会现已诞生，三毛不再流浪了。屋外锣鼓喧天，屋内秋阳满窗，三毛作者宣告三毛从此不再流浪时，不觉大笑。”

父亲开始酝酿如何在新社会、新形势下继续创作三毛这个漫画人物。始终站在平民立场上的父亲，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他满腔热情，要让三毛进入新的生活，在新社会活跃起来……

李香兰与周璇的几桩轶事

沈西城

思》，戏不行，插曲《夜上海》唱遍大江南北。曾楚霖就在此时跟周璇相藉，怜其遭遇，时加劝慰，日久情生，诞下一子曰“曾彼得”。

1957 年 7 月 19 日周璇脑膜炎病发，延医至 9 月 22 日，病逝上海华山医院，终年三十七。

跟周璇同龄的李香兰，命运从容得多。我从未见过周璇，机缘巧合两次观瞻到李香兰的风姿。一次浅谈，一趟默言。

1958 年我随翁灵文伯伯到九龙的片场探他老朋友卜万苍导演的班，卜万苍跟翁伯伯寒暄了几句，忽地说：“老翁！你来得真巧，你女朋友一会儿就来了！”我一怔：女朋友？正自想着，远远一群人簇拥着一个女人朝我们处走来。香风飘逸，有如夜来香，正是一代歌后李香兰！卜老呵呵笑：“老翁，女朋友来了哪！”翁伯伯赶忙迎上去跟李香兰握手，亲昵地聊天。须臾，翁伯伯领着李香兰走到我面前：“小弟，叫李阿姨！”李香兰嗔地娇嚷起来：“别叫得我太老！”风眼飘，樱唇启：“小弟弟：叫姊姊！”我乖巧地叫了，李香兰很高兴：“好好好！姊姊一会给糖吃！”

阿拉伯古文献的汉译本中，时或把该译成“龙涎”的地方翻作“琥珀”，是个意外的疏忽。

刘半农、刘小惠合作翻译并于 1937 年出版的《苏莱曼东游记》（成书于公元 851 年）即把龙涎误翻成琥珀。该书第一卷里有一段文字谈论这种贵重香料，译文道：

他们骑着骆驼到海滨上去走，骆驼看见海水冲上来的琥珀就跪下去——这是训练到如此的——骑骆驼的只须伸手一拾就是了。最好的琥珀，出在赞吉（Zang）一带的海岛上和海边上，形状是圆的，颜色是灰蓝色的，有时可以大得和鸵鸟蛋一样，或者略略小一点。也有许多琥珀，被前文说过的瓦尔（wal）鱼吞吃了。有时候海上的风浪极大，鱼嘴里呕吐出来的琥珀的碎片，几乎有大块的石头的四分之一大。这一种鱼吞吃了许多的大琥珀，就被它们窒息死了，漂浮在水面上……破开它的肚子，取出琥珀来。在内脏深处的琥珀，有一种使人作呕的气味，这气味是伊拉克和波斯造香料的人知道的，名叫做纳达（Nadd）。近背脊处的琥珀，在鱼体内留存愈久，愈纯净。

孟晖

今天，当我们了解抹香鲸与龙涎香的关系之后，不难猜出，这一段文字里所讲的“瓦尔（wal）”乃是抹香鲸，而琥珀则为龙涎香。古人观察到龙涎香出于抹香鲸，但不清楚其真正过程，于是有了各种奇异传说，中国古籍里也记载了多个版本，如南宋《游宦纪闻》中提供的说法之一：“龙涎出大海。西海多龙，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积而能坚，蛟人采之，以为至宝。”在中国古人的认知中，大食国附近海中有一种龙，睡觉时吐出的涎液漂在海面，能凝结成石块一样的固体，而此般凝结物是最贵重的香料，即“龙涎”，命名正是指明了其来源——龙的口液。将中文古籍里的说法与苏莱曼书中内容对照，可以看出是大同小异的解释。

《苏莱曼东游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译呢？因为是照着法译本翻译的。在法语里，龙涎与琥珀为同一个词——ambre。英语的情况类似，严格来讲琥珀为 amber，龙涎为 ambergris，但实际应用中也会有以 amber 指称龙涎的情况。我之所以会注意到这个细节，是因为恰恰犯过同样的错误。2011 年底，我在迪拜的一家小香店里偶然买到一盒名为“大香香”的合香制品，包装

盒的英文配料表上注明包括“amber”，我就理解成琥珀。过了一阵，能看懂英文配料表上对应的阿拉伯文配料表了，发现与 amber 对应的为 عنبر ——如果用英语字母替换拼写的话，大致是 anbar。一查词典，这个阿拉伯词是指龙涎香！这才发现自己搞错了。当然，我买到的那盒便宜玩意所用到的龙涎，肯定不是真货，而是某种人工仿制品。

爱德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中指出：“阿末香（ambergris）这个英文字的意思是‘灰琥珀’，但是先前这个字只是简单地作 amber（琥珀），而 amber 则来源于阿拉伯字 anbar。”也就是说，阿拉伯语的 anbar 传入欧洲语言后，转音为 ambre、úmbar（西）、ambar（葡）、ambra（意）、amber 等，最初就是指龙涎香，但欧洲人后来又用这一个词称呼琥珀，并且，后一个词义逐渐占了上风。为了避免混淆，欧洲人会把琥珀称为“黄琥珀”，龙涎则为“灰琥珀”。

欧洲语言中的这一变化，导致

了我们的学者依据英法译本翻译时出现误解。如《阿拉伯波斯突厥人远东文献注辑》中有伊本·库达特拔《道里郡国志》一书的节录，其中有一句译作：“他们口衔琥珀，到船上换取生铁。”对照来看，阿拉伯原文中，这些“白人”海中健儿游泳到海船上做交易时，口中所叼的乃是 عنبر ——anbar，即龙涎香；法文译本中，这个词译为 ambre，意思自然仍是指龙涎香。但是，中文译者显然误取了 ambre 一词的琥珀之义，在转译中发生了错误。

这部九世纪的地理名著有宋岷先生的完整译本，即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道里邦国志》，宋先生是根据阿拉伯文原本进行的翻译，所以那一句便是：“他们出售龙涎香以换回铁，他们用嘴衔着铁。”底本不同形成译文上的差异，在此再明显不过。

《苏莱曼东游记》在 1983 年有新译本出版，更名为《中国印度见闻录》。这个译本更有意思，卷一根据法文本翻译，于是该译为龙涎的误作琥珀：“有时也用为数不多的琥珀来换铁器。”而依据日译本翻译的卷二中，“关于龙涎香”一节则翻译准确：“每当发现龙涎香，骆驼就会跪在地上，让骑在背上的主人，把龙涎香拾起来……然后，破开鱼肚，取出龙涎香……”

所以，当阅读这类文献时，凡是遇到提及琥珀的地方，最好留一下意，否则可能会读不明白。像《阿拉伯波斯突厥人远东文献注辑》的伊本·巴伊塔尔《药物志》节选，其中整条“龙涎”条目都译成了“琥珀”：“琥珀乃一种海生动物之排泄物……”不明就里的话，就会怪罪古代阿拉伯人，觉得他们的知识很错误。

锦光被这样美好的景色沉醉了，他立刻用手写出了一首抒情气息很浓的曲子《夜来香》，同时也为曲谱写出了歌词。”——原来《夜来香》是不经意写下来的不朽名曲。沪上众女歌星，黎锦光最喜周璇，所作名曲如《满场飞》《疯狂世界》《拷红》统由周璇演唱，为啥《夜来香》却一反常态，改由李香兰唱呢？1944 年，李香兰打东北来到上海，加入“华影”。有一天她跑到“百代”准备录唱片，却在黎锦光办公室发现了《夜来香》的曲谱，拿起照着唱，一唱入了迷，恳求黎锦光给她唱。黎锦光发以想起用周璇，李香兰不依不饶，大发嗔功。“我投降哉！”黎锦光双手半举，终为所动。

再说一桩！1993 年，李香兰通过日本驻港领事馆找吴思远见面，去到沙咀丽晶酒店，方知伊人想拍自传。初步说得投契，下一步东京作长谈。李香兰殷勤招待，饭后命经理陪吴思远往一小会所听歌，原来那里藏有《夜来香》原版音乐。听至半当中，李香兰电话挂来感想。思远说“自是天籁”，李香兰窝心，窝心归窝心，钱不能不讲，狮子大开口，版权费美金五十万。吴思远慨然应允，遂签合同，锁定吴思远监制，张婉婷、罗启锐编导。回港后，众人踌躇满志，搜资料、写剧本，忙个不休。无奈祸自天上降，李香兰经理人忽地越洋赶至，提出终止合约。吴思远早悉个中原委，是老牌大导李翰祥捣鬼，他看自传，有意开拍，托“长春”（满映）旧日老友出面向李香兰套近乎，半途截劫。吴思远仁义，还是很爽气地答应解约了。